

一、前言

哈瑞·马丁松(1904—1978)是瑞典文化界公认的继斯特林堡之后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1974年他和另一位瑞典作家艾温德·约翰松(Eyvind Johnson)分享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称赞他的写作是“捕捉了露珠,映射出宇宙”。“露珠”一词形象说明他对微观世界的兴趣,而“宇宙”一词反映他对宏观世界的思考,两者结合表现了他对自然的关注。

近年来,马丁松在世界文学和瑞典文学中的地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艾斯普马克,2005,页178)。一方面,这是因为他写作的题材广泛涉及20世纪以来人类面对的许多重大国际问题,在很多方面可以说他是个预言家,预见了很多“全球化”的现代社会的问题。拉森就指出:“马丁松的写作如镜子映照出20世纪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社会不公和专制,包括战争与和平,包括商业文化与汽车文化,包括核武器与环境破坏。”(拉森,2005,页3)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翻译马丁松的作品日渐增多,例如日本最近出版了他的长诗《阿尼亚拉号》(Aniara,1956)日语版。这对促进他的作品和思想研究也有推动作用。不过,因为马丁松是本土色彩非常强、非常民族化的作家,他的文学语言有



哈瑞·马丁松(转自瑞典文学院网页)

典型的地方色彩和风景,有非常难翻译的瑞典地方语言特点,也许这是他在其他语言和文化中影响依然有限的一个原因,如拉森所说,“他在国外还是相对来说无人知晓”(拉森,2004,页4)。

因此,与其他著名瑞典作家如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塞尔玛·拉格洛芙、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等相比,马丁松在中国确实也是“相对来说无人知晓”。他的作品,据我所知,还没有一本完整的翻译著作出版。1997年,我曾经翻译过他的代表作《荨麻开花》(Nässlorna blomma,1935)片段,发表在当年的《当代外国文学》上,这大概他的作品首次被介绍到中国。2004年瑞典庆祝马丁松诞辰百年,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包括皇家剧院上演其唯一一部剧作《魏国三刀》(Tre knivar från Wei,1964),我曾经为参加演出的中国编舞人员翻译过剧本,但也还没有在中国找到出版者。中国文学界对马丁松的了解之短浅确实令人汗颜。

相对而言,马丁松对中国文化包括哲学、绘画与历史等多方面却显示了浓厚兴趣。就他对中国文化的的热情和中国人对他的冷漠而言,彼冷此热,显得尤其不平衡。他对中国绘画方面的兴趣则和他本人除了写作也从事绘画有关,其钢笔线描艺术的空灵颇得中国山水画之神。拉什·拜里耶伦就曾在瑞典报刊撰文指出“马丁松和中国哲学与艺术有非常活跃的关系”(拜里耶伦,1989)。马丁松还认为中国的道家哲学和阴阳学说是当代人类处理其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较好解决方案。他在其论文集《陀螺》(Gyro,1985)中就提出了这种观点。中国哲学也很明显地影响了他的著名长诗《阿尼亚拉号》的创作。在剧本《魏国三刀》中,他显示出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并利用中国历史事件作为故事情节,和当时利用中国题材创作剧本的布莱希特不谋而合,不同的是马丁松采用的又是古希腊悲剧的三一律结构。

本文试图分析马丁松这样一个既有非常典型瑞典本土色彩而又非常国际化的作家,虽然从未到过中国,^①为什么对中国文化有如此浓厚兴趣,以及他如何对待中国文化,并用之于自己的写作。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作家,对我来说,这也是和一位瑞典作家的文化对话,是偿还我们积欠他的文化债务。

^① 在撰写本文时,笔者咨询过好友、瑞典“马丁松学会”现主席约然·贝克斯特朗(Göeran Bäckstrand)有关马丁松是否去过中国的问题。约然表示否定并向马丁松的女儿爱娃(Eva)确认,后者亦表示否定。马丁松曾经做过远洋海轮水手,1962年应瑞典《每日新闻》(DN)报之约再作环球海上旅行并作报道,到过美国、日本、澳洲、印度等地,但是没有经过中国,甚至也没有经过香港。参阅马丁松《环球旅行记》(Jorden runtresan,2003)。